

# 百年歷史學發展

許倬雲\*

## 一、 從傳統史學到近代史學

清末以來，中國不僅社會、政治與科技受到西方的影響，許多學術傳統也面對西方新知的挑戰，必須有所因應、調整，傳統歷史學自不例外。清末民初，史學研究吸收許多西方觀念，逐漸過渡為現代史學。

中國歷史學的長期傳統，不論是正史的紀、傳、表、志，或《資治通鑑》的編年體，皆便於敘述而不便於分析。敘述之中，又以陳述史事與褒貶人物為主，這和近代史學的專題討論與分析，在目的與方法上都有所不同。再者，傳統歷史學往往以朝代為段落，但政權的轉移未必與經濟、社會的變化有同步的意義。以朝代為段落的分期方式或可適用於政治史，對於經濟社會史的研究，未必允當。

但中國傳統史學中，也有其便利與先進之處，例如《文獻通考》與《通志》都是以專題方式討論典章制度等史事發展；又如從以編年史為經所勾勒出的「紀事本末體」，專以敘述史事的沿革與發展。這兩種體例，與現代史學觀念相符，容易轉化為近代史學中的史事敘述功能。

中國傳統史學中的歷史論述相當發達。學者常以筆記和雜記的方式記載逸聞、論述史事。清代的顧炎武(1613-1682)以「實學」代替「理學」，強調客觀的調查研究，從事嚴謹的考證，其著作《日知錄》論證精準，如論禮制、政治、史法等；趙翼(1727年—1814年)考證國史，著有《二十二史劄記》，用歸納法比較研究，以觀盛衰治亂之原，有「披沙瀝金」之功。這些史家不僅羅列史事，且頗有分析論斷，每一個主題均有如一篇篇簡

---

\* 中央研究院院士。

短的史學論文。至於明清以來的各種「學案」，多以一個學派或一個思想家為討論的範疇，論述其思想重點與演變。例如黃宗羲的《明儒學案》論述明代學術思想的發展演變和流派，是明代思想史、哲學史、學術史的專著，也是第一部具有嚴格意義的學術史專著。這種體例，也很容易轉化成近代史學中的思想史專論。

清代考證之學盛行，原來的功能大半在於清理古代經典，上從天文地理，下至規章制度，治學內容多以儒家經典為中心。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然而考證之學的方法也正是近代歷史學查證證據、考核史料的方法學。清朝面臨內憂外患，學者逐漸研究實學，乾嘉學派逐漸淡出歷史舞台。例如當邊疆多事之時，學者著意於西北地理與民族關係，相關著作頗多。

王國維認為：近三百年間，學術有三變：清初學者原本多著意於致用之學；到了乾嘉時期，學者肆意稽古；道咸以後，學風又一變，許多知識份子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開始探討富國強民之路，學術上又表現出經世致用的學風。例如為了因應紛至沓來的外患，學者努力研究域外地理學和西北史地，檢查文獻資料，多用考證方法，而且聯接了歷史學和地理學，類似於近代歷史學跨學科的研究方法。

清末，中國許多知識份子從日本引進寰宇新知，將之與中國傳統學術對照，覺得處處新奇。中國於甲午戰敗後，學者對日本能夠迅速興起，頗感興趣。他們瞭解日本變法圖強之術後，對革新一事充滿期待，這種風潮也薰染學術界。魏源提倡「師夷長技」；王韜也認為「天下事未有久而不變者」，主張以歐洲為師，改革變法。他們不約而同地注意到歷史書寫體例，推崇日本採用西方之章節體例與敘事方式。

清末的學者也開始討論史學的基本性質，梁啟超的許多主張，毋寧揭示了當時有識之士的觀點。他於1902年發表《新史學》，開啟現代史學序幕。梁啟超認為史學關乎國家民族命運，所以要宣導新史學，便是要救亡。梁啟超把歷史分為「君史」、「國史」和「民史」。西方近代史學強調「民史」與「國史」。他認為這樣的史學傳統並不見於中國：「民史之著盛于西國，而中土幾絕」。他指出傳統史學兩千年來，不僅正史「強半皆君史」，僅服務一家一姓，極為落後，學者研究史學的目的也偏頗，「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所以史學僅「能鋪敘而不能別裁」，僅「能因襲而不能創作」，因此傳統的史書「難讀」、「難別擇」，令人「無感觸」。即便專門史學論述近於「國史」，但「條理猶有所未盡」。這一議論，揭露了後來史學發展的方向，由政治史擴大到社會經濟史、文化史，生活起居和心靈信仰等項目，其遠見殊堪佩服。

梁啟超認為新的歷史學是「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梁啟超提倡的《新史學》，匯總了當時中國開明、激進學者對傳統史學反省和對新式史學探索的大部分看法，中國現代史學史專家常將其視為中國史學發展演化的一個轉折點，體現當時史家的共同看法。近代中國經歷種種艱難，國家民族觀念因此十分強烈。梁氏的感觸，不僅他的時代所有，其實延續三、四代之久。抗戰期間，錢穆完成《國史大綱》，即是民族史觀的通史，數十年來，風行至今，不僅因為其中論述多有根據，也有相當程度，是由於其發抒的民族文化感情，常得讀者的共鳴。

梁啟超的《新史學》除批判舊史學外，貢獻更在於其有志創建「新史學」，而此「新史學」從本質上看就是「科學的史學」。梁對史學的本質提出了一種界定，認為歷史必然進步，史家的任務就是要總結並描述人類歷史進化背後的通則或規律，顯現其信奉者為「進化史觀」。梁並與其師康有為相似，認為中國經典文化中雖有「進化論」的痕跡，但不夠明顯，使中國史學沒有今日史學理論或歷史哲學。

梁啟超服膺此套歷史進步的觀念，其實是西方文明在19世紀長足進步的反照。西方思想家以此來總結人類歷史整體的演變規律，既體現了一種「目的論」的思維方式，即用現在來解釋過去，也表現了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感。但歐戰的爆發使不少西方人開始懷疑西方文明優越和歷史進步的必然性。戰後梁啟超的訪歐之行，使其對西方文明的態度從崇敬轉向懷疑，改變其對中國史學傳統的批判態度，提出中國人也應該並可能對世界文明作出貢獻。梁氏曾有意撰寫中國通史，但僅有敘論，未見成書。他的理念，則是敘述中國文明從中原，逐步發展為世界中的中國，於是中國不是僅僅華夏所居的禹域，而是世界萬國的一份子。此是梁氏起於國族主義，而超越國族主義，其高明勝於儕輩多矣。

五四前後，推廣西方思想的學者如胡適等人，主張用科學方法審視中國傳統。反應之一，乃是強烈的「疑古」，幾乎要將傳統與現代一刀割切。顧頡剛等人的古史辨運動，即是檢討古代傳說的真實面目。不過，七冊《古史辨》，並非只是全面的「破」，其實也作了不少嚴謹的「立」，還給古代典籍和記載應有的史料價值。由注重史觀建設轉變成重視史學方法，成為中國科學史學的先聲。這種進化史觀，再經過傅斯年等人的努力，轉而成為「史料學派」的理論基礎。

除了方法與內容的演變外，學者也間接從日本的史學界借用了上古、中古、近代的三分法。於是，民國初年若干中國通史也開始用上述三分法處理中國的歷史。這種三分斷代，延續使用下來，無論大學裡的課程或是長時段的斷代史和通史，至今皆已習以為

常。其實，歐洲的三分斷代有其獨特的發展軌跡，若研究中國歷史發展也要使用同樣的斷代方式，甚至切割時代時力求和西方的三分斷代接近，猶如削足適履，反造成理解中國歷史的困擾。

更需注意，目的論的歷史觀，也是民國初年馬克思社會演化論的溫床。嗣後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即是主張以唯物史觀和社會主義立論，建立一套為革命服務的歷史學。